

抉 择

— 对现实存在的 社会主义的批判

〔德〕鲁道夫·巴罗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抉 择

一对现实存在的
社会主义的批判

[德]鲁道夫·巴罗著

严 涛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抉 择

Jueze

——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德〕鲁道夫·巴罗著

严 涛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12.25印张 305,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6,001—8,000

书号 3001·1867 定价 1.50 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鲁道夫·巴罗原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曾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机关刊物《论坛》的副主编。《抉择》一书1977年在西德出版后，同年八月他以涉嫌从事“情报活动”的罪名被逮捕，判处八年徒刑，1979年遇大赦获释，遂去西德，任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

本书题名为《抉择》，据作者的解释，“坚持国家集权主义还是向着普遍解放、向着文化革命前进——这就是抉择。”作者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指苏联和东欧）并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制度，而是“政治官僚专政”，它束缚生产力发展，进而造成普遍官僚主义，使社会处于僵化状态，个性受到严重压抑，“劳动群众的异化”依然存在。作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普遍解放”的问题。而一味追求发展生产不可能达到普遍解放的目标，必须进行他所谓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废除旧的劳动分工，使所有人得到自由发展的条件。

本书问世后很快被译成数种文字，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理论界有较大影响。虽然书中存在一些错误看法，但是可供我国理论工作者研究参考，所以把它全文翻译出版。

序 言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许诺，它将解决现代人类的基本问题，消除人类生存的对抗状态。那些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开宣称，它们坚定不移地拥护这一纲领。但是，倘若人们在当前情况下看一看我们社会生活的实践，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人们能看到新制度通过有效地组织劳动和节约劳动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吗？新制度关于实现人类共同生活人道化的诺言兑现了吗？如果还没有，新制度每天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吗？我们想要创造的是什么样的更美好的生活？难道就是那种平庸的、本身毫无前途的福利（我们徒劳地企图依靠这种福利超越我们传统观念看正走向覆灭的晚期资本主义）吗？我们居然曾希望创造另一种更高的文明！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种同没有矛盾的“完美社会”的幻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新的文明。

现在看得很明白，我们是在仿效旧的文明进行建设。从最深刻的文化意义上而不是政治意义上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被迫地，即在非常现实的强制下，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革命产生的上层建筑，看来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尽量严密而系统地，并以官僚式的秩序井然地去走这条路。正象亲身经历的人实际上都知道的，人对人的统治不过是失去了一层外壳。劳动群众的异化，劳动群众的从属性在新的阶段上继续存在着。新的制度完全陷入国际强权政治和强权外交的旧式必然发展之中。它甚至不能保证和平——不要把这一点同“威慑均势”混淆起来，新制度参与了这种“威慑均势”的扩大再生产。如果人们看一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种令人战栗的景象就会显

现出来。在苏联，自由知识分子反对派至少同政府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国家的首要战略任务是使西伯利亚工业化和军事化。而中国在深挖洞，建造一条抵御北方的新的长城，但是，这一次是在地下，而且是在所有地方。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因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这些矛盾的主要根源存在于“尚未消逝的”苏联历史之中，至少应由此去探寻。令人遗憾的是，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也属于这样一些顽固势力，属于最顽固的现状维护者。这些共产党在它们目前的纲领中根本没有为现在在南非正处于末日的殖民主义灭亡之后的时代指明任何政策。在从殖民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南半球大部分国家里，饥荒正在发生，其后果能使迄今一切阶级斗争和战争相形见绌。工业发达国家的人民同这样的领导人一起不可能经受住这种挑战，后者出于保持政权的原因在每个五年计划里都许诺给予更多的面包和更好的娱乐。这尽管不是在进行新的贫穷说教，但也是宣扬节制，更重要的则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自我发展的真正前景。假如不是由最广泛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又应该由谁来代表这个方向呢？“垂死的资本主义”一直还在用野蛮的方式证实它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把它的盈余投入到永无止境地增加由自然科学研制出来的毁灭性武器上去，以便压制农业国家的人民，并竭尽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其余世界。由于资本主义掌握了技术进步的规律，它不仅迫使不发达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把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较大部分用于军备，而且也把这些国家吸引到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文明中去。正象罗马在覆灭之前毒化过地中海周围地区的生活一样，晚期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一直在扩大它的影响，随着晚期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持续存在，人类变得无法维持其生存了。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在这个世界历史转折关头的任务。他们——最明显的是意大利、西班牙、日本——正在准备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以便争取他们本国人民中

的大多数一致赞同对传统文明进行必要的改造。相反，在东欧的官方共产主义里，根据印刷品和滔滔不绝的演说判断，完全没有面向群众的政治理论思想。革命思想的最新概括，即列宁对革命思想的概括，到现在已过去半个世纪之久了。列宁逝世以来，整个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较之马克思和列宁之间这段时间内的变化更为深刻，更为广泛。世界从列宁的事业开始所发生的实际变化，超出了并且在某些地方完全冲破了他的理论框框，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有什么能比这样的事实更加不言而喻呢？对世界上一切伟大的变革家身后的荣誉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特有的结果更强有力地突出表示他的历史性的创造力呢？

尤其是苏联，它崛起的方式和达到的结果都不同于列宁的预见。这一进步采取了对抗性冲突的途径，并且使千百万人作了无辜的牺牲。今天，苏联人民和东欧各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新制度同它所宣布的原则之间相符合之处微乎其微，它并没有实现原来的目标，没有再越过任何界限。精神的实质已被掏空。结果，处处都显现出，最后在苏联本身也显现出对现存权力结构来说灾难性的思想破产，1968年它在捷克斯洛伐克变得明白可见了。1970年12月以来的波兰事件，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我们这个制度的慢性危机不仅是由暂时的原因，而且还是由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造成的，这些矛盾又植根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从政治上看，乌布利希、拉科西、诺沃提尼、哥穆尔卡等人作为反革命（用不用引号都一样）的真正组织者，一贯抢先占据着权力。

不管怎么说，这种危机带有普遍性质。恰恰是华沙条约领导人本身而不是别人通过1968年初以来连续不断地进行的干涉，毫不含糊地承认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突破的力量具有超出一国的性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内容无非是清楚地暴露了那种由东欧的革命和在它们之前的十月革命产生的真正的社会结构。改革的速度，首先是共产党本身形象的迅速改变，证明这种新的社会

结构至少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是多么迫切期望从在初期阶段曾经保护过这些国家的甲冑中解脱出来，这副甲冑现在正要窒息新的社会结构。1968年挣脱了桎梏，又被用暴力投入旧的枷锁之中的社会潜在力量依然存在，并且必将——起先用消极的抵抗——继续反对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直到有一天也在苏联历史上结束这种制度的时代错误。到那时，继赫鲁晓夫搞的半截子改革之后，还会进行一场更加彻底的人民改革，这场改革不仅要使居统治地位的政治结构适应新的情况，而且要改变政治结构的社会本质。

这场危机不可避免地将1917年以来的整个发展置于历史考验之下，它当然是一个在各个国家以不同的速度向前发展的过程，而且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达到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今后还会有突进和倒退，也会有象七十年代前半期那样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危机冲击着苏联领导下的这个集团的所有国家，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归根结底，这种危机的根源，就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熟知其意义的现代生产力和已变成它的阻力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尖锐化。首先，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绝不意味着它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倒不如说，整个社会在它的国家机器面前变得一无所有了。对生产机构的垄断、对绝大部分剩余产品的垄断、对再生产过程比例的垄断、以及对消费和分配的垄断，导致产生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机制，它的趋势是扼杀人的一切主观首创精神，或者使这种主观首创精神私有化。新社会这种陈腐的政治组织形式深入到了生产过程之中，摧残着社会的推动力。

危机的中心在苏联，尽管是它周围的大地首先震动起来。在苏联，危机只是还没有达到象在诸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地方那样成熟的程度。在目前情况下，苏联领导为逃脱危机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不可能阻止危机尖锐化。8月21日^①的事件恰恰加速了这个集团的其余国家在思想上的分化。正是由

^① 指1968年8月21日苏联等国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译注

于危机的普遍性、广泛性和根本性，正是由于危机的策源地在苏联，才使得改革运动及其使命看起来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颇有希望的前景。苏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讨论已经越来越紧密地围绕着决定性的论点，而二十年代初期的论据，并非偶然地暗暗重新复活。苏联必须进行改革，以便使它的内部发展符合群众的要求，保持它的国际地位。人们将阻止陈旧的势力把它们的特殊利益摆在首位。首先应该为公开讨论“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争得一席之地。

对于我们这些国家执政党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少数派来说，对于所有那些认真负责地为明天着想的人来说，他们较长时间以来所处的基本状况，不仅意味着一种毅力的考验，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思想挑战。苏联、中国、南斯拉夫以及其他进行过革命的国家的历史，不是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富有戏剧性的资料吗？——从喀琅施塔得暴动到波兰沿海地区的暴动，从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先锋队的分裂到中国围绕建立人民公社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斗争，从南斯拉夫开创的“自治社会主义”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半心半意的转变，在这些事件的背后，隐藏着哪些普遍的发展规律呢？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受到哪些矛盾的折磨呢？那些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或在结构上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发展中国家的进程所具有的许多类似现象是怎样产生的？西欧革命运动——从1918年的德国到1968年的法国——的失败意味着什么呢？所有这一切，其中必定有一种说明这些迫切问题的内在联系。

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详尽论述所有这些问题。虽然其中几个问题有大量文献，但是人们有意地不让公众接触到它，因此，也就不可能批判地加以使用。人们用不着达到撰写专著的要求，就可以对整个问题提出看法。而且人们可以着手按照马克思起草《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方式写下所获得的初步成果。马克思在1859年把他为《资本论》作准备而写的著作题名为《政治经济学

批判》。当我在《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一副标题下，模仿这个伟大的榜样时，我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距离马克思在写《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二十年才达到的那种精辟和严谨的程度是多么遥远。但是，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相同的目的：从革命的立场出发对社会形态进行分析。人们会记得马克思的《批判》主要是怀着实际改变世界的意向进行科学的分析。他愈是深入探讨他所要研究的这些关系的本质，他就愈加可以舍弃指责和谩骂，而让他所揭示的种种事实和相互关系来宣传他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研究我的课题的各个不同阶段中，愈来愈努力地把对现状表示的愤慨，归因于现状的合理内核，并且常常首先根据现状的内在逻辑来理解它。这么做，在任何纯粹理想主义的意识看来，必然显得是煽动性的，不合理的。必须尽可能避免对现存关系的一切怨愤。理论和历史的时刻必须首先开始，政治的时刻迟早会随后到来。

本书第一部分研究通往工业社会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

我们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所设想的社会制度有着原则的不同。人们可以用那个理论同这种实践进行比较，但不能衡量这种实践。必须从这种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加以阐述。从赫鲁晓夫到加罗迪的种种变态理论，都只会转移这一任务的视线。经过分析得出了“非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个普遍概念，它包括大多数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还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遗产中探索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起源。在此基础上，接着论述了俄国从农业专制制度到工业专制制度的进步，和在这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命运。人们应当尽力对斯大林主义统治结构的历史性质持公正态度。苏联政治历史的问题不是失败的问题，而是俄国工业化的任务使“主观因素”发生了变态。

“主观因素”不得不屈从于工业化任务。今天，各项新的任务——而不是随便一种政治道德原则——使这个老党犯的时代性错误一目了然。

第二部分系统地剖析（在第一部分进行历史剖析之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结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官僚集权的劳动组织，它的等级式社会特征，直接生产者的无权，生产率相对地缺少动力，它的政治思想组织形式是半神权专制式的国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以全面国有化的异化形式进行的，建立在尚未达到转折点的旧的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

最后一部分是研究抉择的问题，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内部和工业发达的国家中，一般地说，这种抉择正在成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这种抉择具有文化革命的性质，具有变革整个分工、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性质。人类的普遍解放变得越来越迫切了。但是，人们必须重新研究普遍解放的条件，并根据时代的要求确定普遍解放的内容。人类普遍解放下一阶段的社会辩证法，将以为取消劳动的从而也取消国家的统治结构而斗争作为标志。但是，也许那时按知识能力划分社会阶层仍然起支配作用。因此，要进行文化革命必须先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必须同国家机器保持距离，并首先在自己的组织内结束机关的统治。他们必须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口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重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且要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纲领将冲破任何单纯民族或大陆问题的框框。人类一切方面的真正平等，正在成为对实际政策生死攸关的问题。世界正在以既令人鼓舞也令人惊愕的速度变化着，之所以令人惊愕，是由于整个进程还一直自发地朝着任何人没有想到的那种状态前进。只有当发展机会方面的差别在每个国家和全世界消失时，才能赢得和平，人作为族类和个人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保障。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部分 通往工业社会的非资本主义	
道路的现象	1—96
第一章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3
第二章 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起源	33
第三章 从农业专制制度到工业专制制度	64
第二部分 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剖析	97—208
第四章 前提的概述	99
第五章 建立在旧的分工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组织	114
第六章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的社会阶层	134
第七章 对资本主义彼岸工人阶级概念的否定	151
第八章 非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动力及其阻力	169
第九章 党和官僚机构	196
第三部分 共产主义抉择的战略	209—375
第十章 今天普遍解放的条件和前景	211
第十一章 重新改造社会的潜在力量	252
第十二章 共产主义者的组织	289
第十三章 一论文化革命的政治学	311
第十四章 二论文化革命的政治学	334

第 一 部 分
通往工业社会的
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



第 一 章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 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的官方政策有几年曾以这样的思想为依据，即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中，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虽然有人在一本厚厚的书中提出了这一见解，但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加以论述。显而易见，这个思想本来就是怯生生地提出来的。同时，它是要为官僚主义的经济管理辩护的。因此，在当时，它除了引起几个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兴趣之外，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兴趣，也从未引起敌对的预言家们应有的注意。但是，这一思想是自苏联二十年代理论界的讨论暗息之后，在苏联势力范围内提出来的，是社会学家而最具卓识的见解。

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谙熟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大概很清楚这种冲击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同样他们也清楚对这一思想的公开论述难免会不彻底，甚至会适得其反。当时，有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点已经过时了。但是，除了社会经济形态外，马克思主义迄今并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基本的概念。按照新的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还是不是“正在形成的共产主义”？倘若不是，工人阶级又怎能对它直接发生兴趣呢？它会不会导致一场新的大革命呢？对这

样一些令人畏惧的可能性的恐怖感，包含在“相对”（“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这个人们可以随意引伸、转换和颠倒的词里了。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社会主义学的这一最新术语，由于种种原因，从语汇中悄悄地消失了，同时还被明确认为是错误的。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在“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中，含有某些合理主张，首先是一些现实经验。任何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按照他们个人的不同气质和态度——或迟或早都会碰到经典作家的幻想同新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对立、裂痕、鸿沟和深渊。至少存在着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甚至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辩护的提法。这种违背本愿提出来的称号表明，我们那些执政党的实践正在失掉马克思主义正统性。因此，那些较为灵活的年轻一代，出于追求合理性的需要，运用他们的新理论转守为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管怎样，即使在这种保守的提法中，也包含了直至官方理论都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差异！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或多或少都具有哪些原则特征。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并没有给我们的正统学说造成什么困难。他们停留在理想与现实这一范畴的界限之内，所以人们可以轻易地把讨论引向难以得出结论的争吵，即在实现理想的问题上，究竟是“难免有缺陷”呢，还是做得“不好”。“理想主义者”执拗地言必谈畸形变化，指控别人背离了某些原则，要求维护或者恢复这样或那样的准则。他们尽管取得了暂时蛊惑人心的效果，但是，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政策上都对付不了他们的对手立足的基础，即正在“背离”的现实。不久以前，斯维托扎尔·斯托亚诺维奇^①在他的著作《理想与现实之间》中论证，假如人们从这一立场出发，即使他们能象在南斯拉夫那样不受阻碍地进行工作，也还是不能立足于当初革

^① 新·斯托亚诺维奇，南斯拉夫当代哲学家，“实践派”的创建人之一。——译注